

doi: 10.3969/j.issn.1672-0598.2009.04.030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陈安民¹,王江²

(1.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北碚400715;2.四川省通江县实验中学,四川636700)

[摘要]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关键词]江藩;戴震;吴皖分帜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672-0598(2009)04-0150-06

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扬州地区)人。博涉经史,著有《隶经》、《炳烛室杂文》等,尤以其《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而知名,被誉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1](P29)}

《国朝汉学师承记》出,引发激烈争论,大致可谓汉褒宋贬。由此,汉宋之争由暗转明。这,可谓江藩有意为之。但后世学者却据《师承记》之卷帙编排发展出吴皖分帜的观念,并谓“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2](P100)},江氏轻皖重吴,这似乎出于江藩之意料了。

对此,学者们各有解读(详后),分歧甚大。故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江藩论述戴震入手,来探讨他有无吴皖分帜和贵此贱彼之观念。限于学识,疏漏失当之处必多有之,敬请指正。

一、“吴皖分帜”的历史考察

首先,我们有必要梳理下面两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吴皖分帜;以及这一概念出自江藩。

以“学派”的视角系统阐释吴皖之学,始自章太炎。

其论清世汉学,认为“其学著系统者,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

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清儒(一)》)^{[3](P5)}其论惠戴之学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苏徽二派,势不相容”。第二,钱大昕与戴震相较,“钱氏确高于戴氏”(《清代学术之系统》)^{[3](P34)},且对戴震的评价愈益降低。在《清儒(一)》,谓“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3](P7)};而在《清儒(二)》则曰:“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及至《清代学术之系统》,则谓“戴氏之学实比其师江永不如,比同学金榜亦不如”^{[3](P33)},并认为戴震享有盛名因其乃学者中之“政务官”所致。第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认识和评价颇不同于他人,他认为戴氏著此书的主要旨在于“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但此书并非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是针对“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学,常以理学责人,甚至以理学杀人”^{[3](P36)}而作的。可见,章氏对此书的肯定并非“理欲”的层面,而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切入。时人对章氏论清学术的特征已有所注意,认为他树立了“反清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4](P11)}。这也是我们在探讨章氏评论江藩时应注意的。

* [收稿日期]2008-04-08

[作者简介]陈安民(1984-),男,四川通江人,硕士研究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王江(1969-),男,高级教师,四川省通江县实验中学,主要从事高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其论江藩,“素行虽夸,近文,尚受学江、余诸逸民,间闻其风烈,没世未尝试府县庭,韦带布衣,以终黄馘,因身为度,故其言噩噩有锋芒”。又谓“《汉学记》与戴君鉅语,江翁受业余翁,余翁之学本吴惠君,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偏心訾异己”(《说林》(下))^{[31](P75)},后人常从此论,认为江藩轻戴。但须注意的是,章氏的论著中并无吴皖之说出自江氏的只言片语。

“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21](P100)},此见于1904年梁启超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斯时之梁论吴皖之学,多采章氏之说,他自述“叙传授流别,颇采章氏《楹书》而增补之”^{[21](P99)}。

但晚年的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有诸多不同于章氏之处。兹举三点:一是对戴震之学的评价远高于钱大昕,认为“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51](P24)}。二是虽承袭吴皖之说,然强调异中之同,谓“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戴震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51](P24)}三,其论江藩较章氏更为允当,认为“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正宗。实则栋未能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51](P25)},这是说汉宋之争因之而表面化,但江藩“不过将当时社会心态照样写出,不足为病”^{[61](P437)}。其与章氏同者,也认为“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61](P438)}须特别留意者,《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未再提及吴皖之说出自《师承记》。

钱穆则以诸多证据论证“吴皖非分帜”。

章、梁、钱三家论清世学术于后世影响甚大,今人的许多观点便承继他们而来。由上可见,章太炎并未提出吴皖之说出于江藩;梁启超遵循吴皖之分,但明确否定清儒有贵己贱彼之倾向,认为吴皖之说出自江氏,然未予以论证;钱氏则明确肯定吴皖非分帜。后人失于考究,囿于权威,强寻吴皖之说出于江氏的证据。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后世对章、梁所论吴派的进一步研究。

在章、梁、钱之论中,扬州地区的学者皆于吴派

之下论述。张舜徽对此则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当时吴皖学者“笃信谨守,偏狭拘隘”,而扬州诸儒“有独具的精神和风格”,故特表举出“扬州学派”^{[81](P7)},并注重其与吴皖学者的比较阐释。这当与张氏对清代学术的独特理解有关,他认为“清代学者,有些人有师承,有传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谈不上有什么渊源。这是和宋明学术界特别是理学诸儒的学风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在一个地区,彼此影响,自然形成一种学术风尚,这倒是客观存在,至为显著。扬州、常州,都有各自的学风和宗尚,自有综合叙述的必要。”^{[91](P2)}显然,张舜徽更多的强调地域和学术交往的影响。

民国对清朴学家进行系统研究的支伟成,在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此书初版于1925年)中,列有吴、皖、常州、湖南、浙奥诸派,尚未特举出扬州学者。说“扬州学派”为张氏所首次系统阐释似不为过。承继张氏这一理念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对《汉学师承记》,张舜徽也有他的关注之点。对于卷七完全记载生长或流寓在扬州的学者,张氏认为反映了江藩“在编排过程中,也难免阿其所好”,故,“当时的扬州学者们对这书十分推崇,也是极自然之事”^{[81](P101)}。而今承继张氏“扬州学派”这一理念的学者则论,“很有价值更为可贵的是,江藩还在皖派之后将扬州一地的学人单列一卷予以传记,这样的安排在学术史上是有意义的,既揭明了扬州一派与皖派的渊源关系,又凸显了汪中所注重的‘江以北’这一学术群体”^{[111](P176)}。很明显,吴皖学派的划分是流变的,其所包举的范围,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扬州地区学者学派归属的认定上。但当今学者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为梁启超“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师承记》”找依据。

以《汉学师承记》篇章结构的安排作为江藩划分吴皖两派的依据,似乎成了一个共识。这种论述颇为典型:“《师承记》以流派的划分论学术思潮,以代表人物为标题立案。在《师承记》中,江藩第一次划分乾嘉汉学阵营为吴皖两派,此后,章太炎、梁启超加以阐述,吴皖分野说成为学界的不刊之论。”^{[121](P39)}显然,此处承继了梁启超“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师承记》”,而江藩分汉学阵营为

参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56-357。

参阅章太炎《清儒》(一),见于[2]之P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24。

张舜徽初提“扬州学派”当在1946年流寓兰州大学讲学时,后于1959年初版之《清代扬州学记》中有系统阐释。习见的专注、论文中随处可见,恕不备举。

吴、皖两派之依据,则“体现在卷帙编排的先后及各派学术的地位问题上。”^{[13](P31)}

对这一流行的见解并非没有质疑,漆永祥便对《汉学师承记》卷帙分合与意向详加考订,^{[14](P25-27)}并从文字篇幅之长短、所记内容、对惠戴诸人的评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的著录、学者的生卒时间等五个方面就江藩所论吴皖学者进行了细致的比对^{[14](P38-41)},从而认为“在江藩心中,没有吴皖两派纷争角力立的思想与意识;而《汉学师承记》书中,也无有‘尊惠贬戴’或‘详吴略皖’的确凿证据。”^{[14](P41)}漆之考辨精审,逻辑合理。

梁启超眼光敏锐,卓然而立,但他自己也不讳言有“粗率浅薄”^{[15](P2)}之处,我们认为,对其“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亦可作如是观。以梁氏之秉性,对学者之开创性的贡献必定彰而大书,但在其晚年论著中却并未再对此加以阐释。

综上所述,吴皖分野的观念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学者们对其包含的范围也各有不同的看法。追溯谁是首倡者,自有考镜源流之意义,但囿于大师所见,强求证据则过矣。

漆氏之辩驳甚有道理,但似乎在学界的影响不大。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江藩论述戴震这一角度入手,探讨他对吴皖之学的阐释,考察他是否有吴皖分帜和贵己贱彼的观念似乎是有所助益的。

二、江藩笔下的戴震

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休宁人。钱大昕谓其乃“天下奇才”^{[7](P338)};江藩亦以“通儒”^{[16](《洪亮吉传》)}目之;梁启超谓之“乾嘉考据派之‘盟主’”^{[15](P24)}。虽也有对其评价稍低者,但谓其乃乾嘉学林“非一即二”之学者似不为过。

(一) 展现戴震学术之全貌

在戴震本传,江藩首先以凝炼的笔触描述了戴震幼时问难塾师、江永之欣赏及后来交友之轶事,以不到六百字的篇幅将戴震之气质刻画得跃然眼前;传末又记乾隆叹息一事,将震之学问与所受荣宠表达得淋漓尽致。颇见江藩之史笔了得。

江藩谓戴震“长于考辨,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确不可易”;“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知”。又专论戴震论《春秋》、《周髀》、

三角八线之法、《尔雅》、《水经注》,可谓将戴震作为一个汉学家的论学精髓揭示出来了。在传中又录戴震训学者之“私”、“蔽”,介绍《原善》所作之由,认可其“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16](《戴震传》)}。看来,江藩对戴震之学论述是比较全面的,对其义理之学也有所认识。

然今世学者指责江藩未能展现戴震的学术全貌,尤其是关于《孟子字义疏证》所体现的义理之学。我们来看两种解读:一,从“江藩对戴震的力作《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只字不提”得出了江藩对戴震“理学杀人”的主张不满。^{[1](P31)}另有论者谓,“在《戴震传》中,江藩对《孟子字义疏证》在义理方面的发明只字未提”,并据此认为《师承记》“纯为记载清代汉学之成就而设,于理学无所赞毁,观其叙述戴震生养之道存乎欲,感通之道存乎情之旨,绝不提戴氏之痛击宋儒天理人欲之异,可知其绝无门户之见矣。”^{[17](P745)}江藩是否忽略戴震义理之学暂不置论,但将《师承记·戴震传》未提《孟子字义疏证》作为理由,则失之远矣。或许是对《师承记》之体裁失察所致。

《师承记》作为一部纪传体学术史著作,江藩实以几传“互见”之法完整地展现了戴震之学术。纪昀、洪榜、孔广森三传与戴震本传一起,方才构成江氏所论戴震之学术的一个完整链条。

《纪昀传》中,江藩对纪昀的介绍其实比较简略,谓其“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其著述甚少又不外传,故录其“所作《戴氏考工记图序》一篇以见梗概”^{[16](《纪昀传》)},无论江氏之主观意图如何,但客观上展示了戴震之学则无疑。于《洪榜传》,江藩谓洪榜以为《孟子字义疏证》之“功不在禹下”,又全录榜与江藩之师朱笥河论辩震之《与彭进士尺木书》,叹其乃“卫道之儒”^{[16](《洪榜传》)}。于孔广森,传文仅一百五十余字,但全录其《戴氏遗书·序》,该序先总论戴氏之学、再分论其每部著述所作之由,对戴震评价极高,诸如“敏而好学,信而好古,惟于戴君见之矣……君之著书可谓博矣,君之见道可谓深矣”。而江藩结语则论,“广森深于戴氏之学,故能义探其原,言则于古也。世人徒赏其文词之工,抑亦未矣。”^{[16](《孔广森传》)}由此可见江藩对孔广森论戴氏之学的认可。综合三传,谓江氏不曾谈及戴氏义理之学,似乎不甚妥当,而谓其对

如章太炎就认为戴氏之学确不如钱大昕(见于其所著《清代学术之系统》)。

梁启超、钱穆等论戴学不论篇幅长短都记述了戴震幼年问难塾师之事;《清史列传·戴震传》删节此细节便顿时失色不少(《清史稿》袭之)。关于江藩研究二题[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03-0054-05。

漆永祥就《师承记》到底是学案体还是纪传体有考察,请参阅其《汉学师承记笺释》前言第21-22页。

《孟子字义疏证》“只字未提 则冤矣。

此外,《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之体例被公认为较《师承记》为严,然《孟子字义疏证》也赫然在列(《论语》条下)。当然,江藩论戴氏之学处处都流露出一位纯汉学家的视角,这在江藩论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

在江藩看来,戴震还是壮大了汉学阵营的导师。

金榜与戴震同为江永弟子,江藩特别强调他“与休宁戴编修震相亲善,承师友之训,所以学有根柢,言无枝叶”^[16](《金榜传》)。诸多后学,则在戴震的影响之下走上治汉学之路。卢文绍“与东原交善,始潜心汉学,精于雠校”^[16](《卢文绍传》);汪元亮“与戴君相亲善,乃究心经义及六书之学”^[16](《汪元亮传》);孔广森“少受经于东原氏”^[16](《孔广森传》);汪光燾习闻戴编修东原等诸老宿名论,“乃潜志读书”^[16](《汪光燾传》)。

以上诸人多乃汉学中坚,江藩所论大体不差,然江藩所论以下两人则值得考究了。

程晋芳,江藩入于《师承记》,谓其“及官京师,与笥河师、戴君东原游,乃治经,究心训诂”^[16](《程晋芳传》)。然观程氏之学,更多的倾向宋学,对汉学颇多抵牾之处,江藩截其枝叶,也作为一戴氏后学入了汉学家阵营。

戴氏之学不仅光大与汉学家阵营,且声威远播于宋室。为江藩入于《国朝宋学渊源记》之罗有高,“见戴东原太史于京师,始检《注疏》及《尔雅》、《说文解字》诸书为训诂之学。”^[18](《罗有高传》)由此可见江藩心目中戴震之影响力。

(三)戴震谓“晓徵为第二人”

戴震、钱大昕之学孰高孰低,迄无定论。江藩于《钱大昕传》中,录有戴震评钱大昕一语,“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他据此认为,大概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随即江藩比较了二氏之学,“东原之学,以肆经为宗,若先生学究天人,博宗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16](《钱大昕传》)显然,在江藩看来,钱氏之学优于东原,故对东原毅然自居第一颇多讥诮之色。

江藩的寥寥数语,对戴震之“清誉”颇具杀伤力,影响深远。承接江氏所论,目东原为狂生者有

之,为东原辩解者有之,表示理解者有之。

目戴震为狂生,以章太炎、张舜徽为代表。前已述及,章太炎认为钱氏之学确高于戴氏,并全录江藩之语。张舜徽亦袭此论,谓东原“以第二人与钱,而悍然自居魁首,可以想见其骄狂之气”^[19](P9)。

钱穆与以上诸人的看法相反,认为戴震评价钱大昕之语无可厚非。一方面,从时间上说,竹汀始治声音、文字、训诂之学,“上距惠戴扬州缔交亦十三年”,钱氏走上汉学之路“实闻惠戴而起”,相对戴震,钱大昕乃学术上的晚辈。另一方面,在钱穆看来,钱大昕“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然“惠戴而外,学足以拔赵立汉,别树一帜者,端推竹汀也”。故钱穆认为“宜东原之以第二人处之”^[7](P366)。

在以上两种意见之外,余英时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解读,“东原凭什么理由把钱大昕贬为第二人,而又毅然自居第一呢?显然东原在这里是用义理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如果以考证范围的广博而论,钱大昕在乾隆时代绝无人可与之比肩”^[19](P9)。

观章、钱之论,二者意见截然相反,从逻辑上讲,自当以其学的优劣定评。余氏所论,甚为有理。然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则尚待深讨。

与戴震相较,钱大昕可谓长寿,其学术成就也可谓晚年大成。一般认为,从乾隆四十年(1775)他奔父丧起到嘉庆九年(1803)卒于紫阳书院,乃钱大昕的归田期。这也是他著述的丰收期,“其主要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等,都是在这一个时期完成的。”^[20](《校点前言》P4)戴氏谓“晓徵为第二人”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而戴震卒于1777年,其时钱大昕之著作刊成者仅《金石文跋尾》六卷,戴震未见钱氏将来之学问便谓之为第二人,真可谓精鉴知人。陈鸿森便从二者的生卒时间和刊刻时间考察这一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诸位大师言必有据,各有解读,但却忽视了“时间”这一核心要素,值得深思。以后见之明来看,钱穆之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江藩认为钱氏之学高于戴氏,便贸然论断,还颇有不平之气,章太炎和张舜徽亦承江藩而论。余英时给出一分为二的解读,但可谓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其子江钧《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之收录标准,谓“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见于卷末)。江藩论戴震这学术自然也会经过如此一番的透视。

关于程氏之学,参见程治国,程晋芳研究[J],兰州大学2007硕士学位论文(见于CNKI数据库)。

参阅其为漆永祥之《汉学师承记笺释》所作序言第9—10页

三、轻戴重惠与略皖轻吴

前已述及,认为江藩首次提出吴皖派并轻戴重惠,出自章太炎和梁启超。钱穆则认为吴皖非分帜。然而,后人多从章梁之说,并寻求依据,不断放大,遂使章梁之论有几成定论之势。今人漆永祥力驳此论,但其见解似乎并未为时人所普遍接受。笔者从漆氏之论,在他的基础上,拟再从以下三个方面析而论之。

(一)品人论学以戴震为参照——见戴震之重

戴震之学为江藩所重,突出地表现在将戴震作为参照系评价他人之学上。兹举一例:程在仁谓罗有高“可谓天下第一学人”,对此,江藩痛加贬斥,谓“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18](《罗有高传》)}江藩所论确切与否,姑且不论,其举戴震以驳前者,颇见东原在其心中之重。

后世公认吴派学者重师守训,这一点在江藩身上亦颇有体现。余古农乃引领江藩走入汉学门径的恩师,江藩对戴震非难其《古经解钩沈》甚为不满,“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钩者。然沈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沈,则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书,岂有是哉!”^{[16](《余古农先生传》)}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接着,江藩论及余氏作书的情境和自己身遭多故而有辱师命的无奈,颇动感情。与余古农交游者甚众,对其评议也大有人在,但此处引戴而驳,可见戴震之影响与分量。

上乃对戴之批评的辩解,而引戴之称美他人亦可见戴震之重。江永之学为文恭所知,实以东原为桥梁,江藩如实记之,并评论曰:“考永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侔匹,非溢美之辞。”^{[16](《江永传》)}这可见江藩对江永之学的认可,当然也见戴震评价的公允和权威。

戴震在江藩心目中所重如此,我们再看江藩友朋对戴震之看法,以及他们有无吴皖分帜之念。

(二)友朋论惠戴之学——无轻此重彼、吴皖分帜之念

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年35岁的戴震游扬州,与惠栋交识论学,客居扬州四年。自是他论学宗旨始变,从三十年《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可明确感知,而他在为余古农《古经解钩沈》所作序言

中则明确提出“以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之治经方法。故钱穆认为,至此“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7](P356)}此乃后学所论,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大致与戴震同辈的学者,看看他们是怎么认识惠戴之学的。

为更有说服力,让我们把目光主要聚焦于后世视为吴派的学者。凌廷堪于东原卒后所作《事略状》中,谓“东原于扬州元和惠栋,论学有和”;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而王鸣盛则明确表示当时学者“断推惠、戴两家”。从这些大致与戴震同时代的学者之言论来看,他们并无轻彼重此的迹象,而是吴皖并尊的。

在江藩友朋中,对他有特殊影响的阮元和汪中也极重戴震之学。阮元重视戴震之学,可见于其序《师承记》中,他谓:“元又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剪裁,引系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16](阮序)}这是直接以戴震为治学、著述体例的榜样。汪中乃“藩弱冠时,即与君定交,日相过从”的挚友,江藩谓汪中治经宗汉学,他认为“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沈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腓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16](《汪中传》)}由此可见汪中对戴震的评价之高。又汪中之子汪喜孙在为《师承记》所作跋语(作于嘉庆十七年五月七日)中谓“国朝汉学昌明,超佚前古,阎百诗驳伪孔,梅定九定历算,惠定宇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哀然著述,显于当代。”^{[16](汪跋)}此等表述与其父可谓如出一辙。从阮元、汪中父子之论可见,在江藩其时和周围并无轻戴的迹象,遑论横亘着吴皖两派观念了。

学术观念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定有一个广泛传播而广为接受的过程。如上所见,在大致与戴震同时代的学者中间,并无轻戴重惠和吴皖分野的观念;而于江藩友朋中亦无此迹象,以其交游之密,必当于书函著述中有所表露,然我们暂时却未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相反,斯时倒有人谓江藩乃

这也是证明江藩重视徽学的绝佳证据。

候外庐也读到了这一时期戴震论学的变化,谓之前,戴震虽力倡汉学,但不排斥宋学;后期则独标新义力攻宋学。此与惠栋之影响不无关系。见于《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399页。

笔者行文中,如无特别说明,皆从吴皖两部分,不特举出扬州学派。

此处所引转引自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6页。

惠戴兼师,如李斗于《扬州画舫录》卷九论,“江藩,字子屏,号郑堂。幼受业于苏州余仲林,遂为惠氏之学。又参以江慎修、戴东原二家。”^[16](P194)

(三)江藩对戴震评价甚高

在《戴震传》中,江藩对戴震之聪颖和所受荣宠颇为欣赏、羡慕,但并无直接评价戴震之处。在江藩看来,戴震颇为狂妄前已述及《钱大昕传》,在《朱笥河师传》中再次表达了这种印象,谓其“兀傲不群,好雌黄人物”^[16](《朱笥河师传》)。此乃江藩论及戴震之品性,可以一“狂”字盖之。

其实,江藩对戴震的学术地位有高度的肯定。

《师承记·序》集中表达了江藩对于经学发展史的看法。认为“至本朝,三惠之学甚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16](卷一·自序)可见江藩对戴震评价之高。然而有论者竟将“继起于歙”作为江藩轻戴重惠的证据,实在遗憾。我们认为,江藩作为惠学嫡派再传弟子,先举己师,从情理上讲无可厚非。事实上,三惠之最少者惠栋较戴震年长二十六岁(1697/1723),此种表达实无可深究之处,将其作为江藩轻皖重吴之证据,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参考文献】

- [1] 三英. 江藩和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2(1).
- [2]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3] 章太炎, 刘师培.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4] 章太炎, 刘师培, 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A]. 罗志田.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C].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 [5]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A]. 朱维铮校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6]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A]. 朱维铮校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7]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M]. 商务印书馆, 1997.
- [8] 张舜徽. 张舜徽集:清代扬州学记 顾亭林学记[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9] 张舜徽.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支伟成.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M]. 岳麓书社, 1986.
- [11] 高明峰.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述论[J]. 求索, 2005(02).
- [12] 王应宪.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J]. 史学史研究, 2005(01).
- [13] 王应宪. 《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 [14] 漆永祥. 《汉学师承记》笺释[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5] 朱维铮. 校注引言[J]. 朱维铮校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16]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M]. 中华书局, 1982.
- [17] 陈荣捷. “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案, 韦政通编. 中国哲学辞典大全[Z]. 水牛出版社印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89.
- [18] 江藩. 国朝宋学渊源记[A]. 国朝汉学师承记[C]. 中华书局, 1982.
- [19] 陈鸿森. 《汉学师承记》笺释·序[A]. 漆永祥. 《汉学师承记》笺释[C].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0] 钱大昕撰. 吴友仁校点:潜研堂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21] 李斗撰. 扬州画舫录(卷九)[M]. 中华书局, 1997.

(责任编辑:杨 睿)

The opposition of Wu-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CHEN An-min¹, WANG Jia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 Sichuan Tongjiang County Experimental School, Sichuan Tongjiang 6367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inological Pedigree of Qing Dynasty, The Catalogue of Confucian Masters And Their Works of Qing Dynasty, The Song School Pedigree of Qing Dynasty, JiangFan almost grasps all features of DaiZhen's learning thought, and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DaiZhen's influence on his friends and later students, certainly many places were seeing JiangFan's "pure sinology view"; JiangFan is not satisfied with DaiZhen's evaluation on Qian Daxin. "The later one is the second person", its cause for his thinking that DaiZhen's learning achievement is lower than Qian Daxin, in fact, his evaluation on DaiZhen is often equal to Hu Dong. Furthermore, JiangFan evaluates that the others are often based on the critic of DaiZhen, the senior scholars and the friends of JiangFan are also not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one or the others. So it is not sensible to think that the idea of the opposition of Wu-Wan Schools is sent from Jiangfan and he is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one or the others.

Keywords: JiangFan; DaiZhen; the opposition of Wu-Wan Schools

李斗(? - 1817)字北有,号艾堂。江苏仪征人。他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起开始收集资料,准备编写《扬州画舫录》,至乾隆六十年(1795),历31年时间终成,18卷。

王永宪:“江藩谓汉学发展‘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突出了吴派在清代汉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见王应宪《国朝汉学承记》研究,华东师大2005硕士学位论文第31页)。